学术专论

重论晚清经今古文学之争

——与两汉经学的比较研究

黄燕强

［**摘要**］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本文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关键词**］今文学　古文学　王官学　民间学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3－0073－14

一

两汉经学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争，但自马融、郑玄等遍注群经而沟通二派后，魏晋以降，民间学大盛而王官学式微。这表现在经学研究上，一是王官博士所传经书渐渐散失而无人传承，如齐诗、鲁诗；二是学者解经侧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微言大义，这与汉代民间学的求真求是精神相近，与王官学的经世致用理想相远。故在乾嘉以前，两汉经学论争的性质久不为经生所注意；及至晚清，庄存与作《春秋正辞》，发《公羊》大义，以王官学为今文经学。刘逢禄申演之，述《公羊何氏释例》，重订汉儒经学之辩辞，力证《左氏》之不传经。其后，龚自珍、魏源皆阐幽发微、踵事增华，发掘《公羊》大一统之理及复原“三家诗”和今文《尚书》之义。廖平承之，先是平分今古学，其学二变后，乃尊今学而抑古学，以今文为孔学之正宗，古文则非是。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雄辩古文皆伪，斥之为刘歆、王莽所造作，且径以“新学”名之，谓其乃新朝之术，非孔子之学，不得篡圣称经。[①]廖、康又主《王制》为“素王之制”，《周礼》是“乱世之书”，一真一伪，判若正邪。与之论辩的经古文家章太炎、刘师培宣称，经学即史学，故非《左氏》则《春秋》之事不能明，盖《春秋》是史书非哲学，《公羊》“三世”“三统”说

［**收稿日期**］2013－01－10
［**作者简介**］黄燕强（1983—），男，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hyq4413@ aliyun. com

① “清华简”属战国中晚期之物，其中有《古文尚书》，又有与《左传》相印证的《系年》，这可驳斥“新学”“伪学”之无稽。

是汉儒的附会，非孔子之义；又说，《王制》是汉博士之作，非孔子为汉家所制的“大法”，《周礼》是孔子所述周公之学，载录了周代的典章制度，故古文学才是经学的正宗。

然而，无论主今文者，抑或主古文者，都把这一争论追溯至两汉，如廖平、刘师培说，经今古文之争始自刘歆。西汉成、哀帝间，刘歆校书中秘，发见古文诸经《毛诗》《周礼》《左氏》等，欲为之立官学，乃移书太常博士而责让之，后虽获罪却使古文经大行于东汉，最终取今文学而代之，且令其几近乎消亡。关于两汉今古文学的异同，廖平的《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列有详细条目，如谓今文祖孔子，是经学派，以《王制》为主，以《春秋》为正宗，且信纬书，旨在发挥义理；古文祖周公，是史学派，以《周礼》为主及正宗，斥纬书为诬妄，重在考据事实。总之，他们相信，今古文学是对汉代经学史的重新发现。

近百年来，经学和经学史的研究（所谓“超越今古文学”者，只是不专主今文或古文中之一家，但仍承认汉代经学确有今古文之分），在叙述汉学或清学时，都绕不开今古文两派对立的问题。故论汉学者必曰，西汉是今文学盛行，东汉则古文学逐渐凌越之，今文主……古文主……，完全依照晚清今古文学家所发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建立经学史的架构。然则，对于廖平、康有为等人的经学研究，时人已颇多意见。章太炎说：“康有为以《公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学问也。”① 顾颉刚也说今文家是“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②。章、顾指出，康有为是以学术为政治的宣传工具，既非严肃求是地研究学问，他的经学自然有失真失实处，不尽可从。钱玄同说：“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诂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或又谓，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③ 如其言，这种义理与考据、孔学与史学的分门别户的对立，是晚清的现象，非两汉经学之情实。钱穆也表示：“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④ 钱先生且认为，经今古文学仅起于晚清，是道、咸以下的经学家因门户之见而造成的出主入奴与主杨主墨的辩争，并非两汉经学的实况，故所谓的今古文家之说皆不足信。蒙文通虽学承廖平，论汉学不脱今古学之二元，但不徒守乃师之门户而上溯晚周，故有“学术中绝无所谓今古学……究空说则今古若有坚固不破之界限，寻实义则今古乃学术中之假名”⑤ 这样超越今古学的通达之见。之后，徐复观也说：“这一公案，不是用今文、古文之争所能概括、所能说明的。”⑥ 汉学或有学术之争，但至少不在于文字之今古。二十年前，李学勤也倡此说，认为汉代经今古学之分派，于史无据，于廖平则有征，故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⑦。在海外，美国学者戴梅可教授也注意到：“有不少证据揭示出汉代知识分子并未不断地争论此问题，换言之，清末热烈话题在汉代找不出相同之对比。汉代当然有今文、古文书。但此分别一则很普遍，二则比一般人所认为较不重要。几乎没有证据表示汉代学者将自己分为今文、古

---

① 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见章太炎、刘师培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35 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43 页。另外，钱穆戏称为：“有新闻纸的气息”，杨宽说它“只是宣传而不是学术”，见顾颉刚《经今文学的兴起与贡献》。

③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精读钱玄同》，鹭江出版社，2007 年，第 151—152 页。

④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 自序》，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6 页。

⑤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氏著《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2 页。

⑥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氏著《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160 页。

⑦ 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35 页。

文两家。”德国学者苏费翔教授也曾撰文阐述钱穆平分今古文学的观点。[①]

我们认为，晚清经学诚有今古文之争，汉代经学也有学术上的辩论，但并不如廖平表中所列那般针锋相对，其性质也不是哲学与史学或主《王制》与主《周礼》的差异，其范畴亦非文字之今古的经书，其方法更不在义理与考据的对峙，而应是朝廷官学求致用与民间私学求真是的不同的学术精神的体现。虽然钱玄同、钱穆、蒙文通、徐复观等对这一问题都有所辨正，却也有所未周，盖诸人都未能从“六经皆史”的思维中走出来，仍把《左传》《周礼》等看作史学或史料，与汉儒之说不相符。且近年出版的多种经学史著作，依旧未能绕出今古文学二元对立的壁垒，如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吴雁南等的《中国经学史》和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因此，如李学勤先生说的，今日还有必要重新检讨汉代经今古文学的问题，以矫正此行之已久的“成见”。基于此，文章试从晚清今古文家所列的汉学对立之条目中，选出其所最重视者，如今文与古文、孔学与史学、《王制》与《周礼》、义理与考据等四方面来论证，凡此涉及经学的性质、范畴和方法论，希望对这些紧要命题的廓清，能多少还原汉代王官学与民间学的实质及二者之关系。

二

首先，今文与古文。所谓今古文者，是以文字为标准；王国维说，汉代隶体称今文，六国文字称古文。[②] 晚清今古文家主张，凡用隶体抄写的文本是今文经，用六国古文抄写的文本是古文经，因文字有今、古之别，经学也有今文派与古文派之分。前者是立于太常而置博士弟子的《诗》齐、鲁、韩，《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仪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氏，《春秋》严、颜；后者是未立于太常而行于民间的《毛诗》、孔安国传壁中《尚书》及《逸礼》、《周礼》、《费氏易》和《左氏春秋》。晚清主今古文者认为，王官学诸经在汉初已经隶定为时体字，民间本或出孔壁，或藏中秘，未尝集诸人隶释，以古文字行于世。实则不然，盖汉代所流行的无论是王官本，抑或是民间本，在汉初都已隶定为时体字，故不应以文字为判别学派之尺度。请试证明之。A、易：《后汉书·儒林传》说《费氏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③]。王国维疑之，以为《汉书》无此语，或是后人因刘向校《费氏经》与古文经同而傅会之。[④] 尚秉和也说，《费氏易》不可能皆从古文。[⑤] 徐复观乃直指“《费氏易》并非古文”。[⑥] B、书：《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⑦] 徐复观据此指出：“‘以今文读之’，即是依今文校雠古文，并进而以今文写定古文。”[⑧] 故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实际是今文本。C、诗：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考》说：“《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

---

① ［美］戴梅可《汉代今文与古文之争》，（Nylan，Michael.“The Chin Wen/Ku Wen Controversy In Han Times.”T’oung Pao LXXX（1994）：83—146.）转引自苏费翔《钱穆两汉经今古学研究》，提交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变动时代的经学和经学家（1912—1949）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 年 7 月。

②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二）卷 7，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05 页。钱玄同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观诸经和《说文》所存“古文”，确有许多是假借字。或又谓，近年出土各种“六国文字”皆与许慎《说文》所收“古文”不同，许书的“古文”或是邹鲁、齐国儒生习用的文字。

③ 《后汉书》卷 79 上《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548 页。

④ 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观堂集林》（二）卷 7，第 321 页。

⑤ 尚秉和：《易说评议》，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8 页。

⑥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79 页。

⑦ 《汉书》卷 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607 页。

⑧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99 页。

不复有古文本矣。”[①] 徐复观也说：“汉初经文传自先秦之祖本，皆为古文，毛《诗》的祖本亦必为古文；但入汉而行于世的则皆为今文，毛《诗》亦必为今文。”[②] 则《毛诗》的写本在汉初也已非六国古文，而是汉之时体字。D、周礼：《周礼》的隶定或成于刘歆，但今文本行，古文本也未废，故郑玄注《周礼》，多引“故书”解之，阮元《校勘记》云：“其云‘故书’者，谓初献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间传写不同者则为今书。”[③] 中秘本犹是古文，民间本则已是今文。E、左氏：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左氏》在授受中应已隶定，刘歆所见的古文本，特因藏于中秘，不得流传，人所难见，故无从隶定。由上知，晚清今文家说的古文经，如《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等，在汉初都和今文诸经一般，早已隶定为汉之时体字，《周礼》至迟在西汉末也已隶定。另外，如龚自珍说，伏生壁中书原是古文，欧阳、夏侯等人以今文读之，这与孔安国以今文读孔壁《古文尚书》无异，故二书“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④]。史杰鹏说，《仪礼》有今文，也有古文，如《士婚礼》：“大羹湆在爨”，郑玄注：“今文‘湆’皆作‘汁’”。《有司彻》：“二手执桃匕枋”，郑玄注：“今文‘桃’作抗。”例证尚多，不赘举。[⑤] 那么，今文《尚书》和《仪礼》的原本在汉初也与古文本一样，同是六国古文字。故刘师培说：“汉初之传经者，若伏生、辕固、韩婴之流，均易经文为汉字。”[⑥] 而在转“易”文字之前则仍为古文。由此知，所谓的古文经未必全是“古文”，而今文经也曾是“古文”，或汉时仍多保留了“古文”，凭文字不足以析分今古学之派别，而汉儒也未尝以文字的今古来分门别户，汉代经学之争也非今文与古文所能范囿者。徐复观说：“古学的性格，不是‘古文之学’的简称，而是反博士垄断的旗印。”[⑦] 反对博士对学术的独断，是乃王官学与民间学的论争。

返观两汉，司马迁《史记》言“今文”者一见，《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⑧] 这里，“今文”与“古文”对待而言，应指字体的今古之别。然汉初王官诸经也曾经过由古字而今字的隶定，史公不过记录孔氏隶释的事实，并不以之分别今古文《尚书》为两派。且武帝末年，河内女子献古文《泰誓》三篇，乃付与博士；其讲读之始，必先隶定文字，欧阳氏还将此古文本加入其所传的王官本。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书各一篇；“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⑨]。这是博士两次使今古合璧，也是西汉无今文与古文对峙的显证。故《史记》虽十处提及“古文”，如“不离古文者近是”[⑩]，“《春秋》古文”[⑪]，“年十岁则诵古文……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⑫]，皆特指“六艺”，非谓古文经。[⑬] 盖诸经虽已隶定，但中秘仍藏有古文字本，司马迁为太史令而得窥见之，因有是言。刘向校书中秘也用古本订正通行本，如以中古文《尚书》校欧

---

① 王国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观堂集林》（二）卷 7，第 322 页。
②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117 页。
③ 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序》，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637 页。
④ 龚自珍：《大誓答问第二十四》，见《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年，第 75 页。王国维、吴汝纶说同，分别见《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再记写本〈尚书〉后》。
⑤ 史杰鹏：《〈仪礼〉今古文差异释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3 期。
⑥ 刘师培：《论今古文之分仅以文字不同之故》，见《刘师培讲经学》，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133 页。
⑦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154 页。
⑧ 《史记》卷 121《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 版，第 3125 页。
⑨ 王充：《论衡》卷 28《正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47 页。
⑩ 《史记》卷 1《五帝本纪赞》，第 46 页。
⑪ 《史记》卷 31《吴太伯世家》，第 1475 页。
⑫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 3293、3319 页。
⑬ 参见蒙文通《经学抉原》，第 59、61 页。钱穆《国学概论·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两汉博士家法考·史记中之古文》亦主此说。

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经文，发现诸本或有脱简，或有脱编。司马迁、刘向皆习王官学者，但非惟不排斥古文，且又宗信古文，如司马迁自小诵读古文，又从孔安国问故，刘向采《左氏》作《说苑》《新序》等，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后世所谓的壁垒森严的今文与古文之派别，凡社会流通的经书都已为时体字，古文字本乃藏于中秘的五经，官学本和民间本皆有之，不专指《毛诗》《左氏》《周礼》等。

至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标示的“古文”，特指其校书中秘所见之古文版本，非谓诸经之出于壁中、行于民间者，仍为古文字本。如谓，鲁恭王得孔壁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①。安国曾隶定《尚书》，其所献者或有古文之原本，应也包括业已隶释好的今文字本；刘歆或见中秘的古文《尚书》，但也定然知道此经已有今文字本，而仍名之“古文”者，只是强调它所从来的本始和原貌，表明它是有历史渊源和根据的，既非伪作，也非谓诸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从未隶释为时体字。故在刘歆，“古文”不是与“今文”对待而言的，它仅是一种表示历史来源的符号，证明民间群经的历时性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学派的象征性标识。② 后世把刘歆看成今古文相争的始作俑者，“然在当时，亦未尝有今古文相争之名”③，且未有今古文相争之实，盖非惟王官博士不予理会，且刘歆也不斤斤于表面的文字，观其与刘向较论《左氏》之义理而非简编之完阙或文字之今古可知。

诚然，汉儒有称今本、古本或今学、古学者，如许慎《五经异义》、郑玄《驳〈五经异义〉》；然汉儒所谓今、古者，非指文字是汉之时文或六国古文，而是指经书的版本是汉代今本，抑或先秦古本；即前面讲的，是民间流行本，或中秘典藏本，后者是著其所从来的历史渊源，非与“今文”对待而言。这如传世本《缁衣》之与郭店本《缁衣》，乃版本上的时间问题而与文字无关紧要，更不至于由此衍生出两派势同水火的学术之争，汉儒的“今本”、“古本”之说大概如是。所以，过分地强调文字的差异而引出文本与义理的或残或全、或真或伪等问题，恐非汉儒所在意者。《后汉书·郑玄传》说：“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④ 此谓“古今学”而非“古今文”，说明诸生所争者在学术而不在文字。“古学”一词是刘歆发展出来的指称被博士所排斥的一组经典，桓谭、杜林、卫宏、郑兴、贾逵等都用“古学”之名，但却不以今古文划分，其所指称的实乃民间流行之今文字本，故与之对待的“今学”之名，是指博士的官学本，非特指今文字体者。⑤ 故今本、古本“有如后世版本的不同，在学术上仅是校勘、训诂上的问题，不足以构成学术上的重大争论”⑥。由此而来的今学、古学，则分属王官学与民间学的范畴，虽在学术上有义理诠释和方法论的不同问题，但汉儒从无执文字之今古以定经学之派别者，用文字为准绳而分经今古学的，是晚清经学家所创，非两汉经学之实情。

其二，《王制》与《周礼》。廖平《今古学考》全据礼制以分界经今古学，他说孔子作《王制》，周公作《周礼》；《王制》属今文，是孔子修改周代制度以救文胜之弊，寄托“素王之制”；《周礼》述周代礼仪，是历史的记录，且文胜其质，其道已衰，流弊滋甚，唯素王的《王制》足以拯之，挽世界返归太平。故廖平又作《王制集说》、《王制订》等，进而发明“孔子改制”之说；作《知圣篇》、《辟刘篇》等，斥责歆莽之伪、古学之虚。其学“三变”后，廖又以

---

① 《汉书》卷 36《刘歆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969 页。

②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谓，刘歆《移书》所谓“古文”者，犹云“旧书”，非谓古文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67 页。)

③ 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107 页。

④ 《后汉书》卷 35《郑玄传》，第 1208 页。

⑤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氏著《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161—163 页。徐又说：“所以今古文问题的本质，是一种校雠上谁对谁错、谁较完备、谁较残缺的问题，这是很简单可以处理、很简单可以判定的问题。”（第 100 页）即今本与古本是版本上的差别，非关文字。

⑥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156 页。

《王制》为孔子早年之作，《周礼》是孔子晚年之作，且古文《周礼》为大统，今文《王制》为小统，二者“一大一小，一内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①，都是圣王治理海内与海外的政治哲学，孔子是全球的大圣，六艺是宇宙之公言。至于康有为，由其《教学通义》指认“《王制》为后儒采定之制，不尽合周制，未足据也”②，及其“早年酷好《周礼》”③，可知他早期经学思想，“对周公和周礼的赞誉，清楚表明了古文经学派的影响”④，他不止“尊周公、崇《周礼》”⑤，贬抑《王制》而宗法刘歆，还曾批判何休及其《春秋公羊学解诂》。及会晤廖平后，康乃彻底放弃古文学而转向今文学⑥，说“《王制》者，盖孔子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⑦，并撰《伪经考》、《改制考》批判《周礼》及古文诸经为刘歆之伪，是新莽篡位之资，不惟与圣王之学无与，且乱圣制、篡学统，是圣经之篡贼、国家之鸩毒者。⑧ 可见，廖、康对二书的归属和意旨都有过相反的观点，时人说他们是以宣传为学问，非求是地研究学术，未尝没有道理。有鉴于今文家态度和观点的反复，刘咸炘已有针砭：“《周官》周公之作，降而为六国时书，又降而为刘歆所造；《王制》则自汉博士之作，升而为秦汉间儒者之书，又升而为七十子后大贤之作，其无定如此。”⑨ 廖、康是以时义为学术之转向，时势不定，学术也多变，这在他们来说是自然之事，如以之为两汉经学之情实则非也。

今乃持廖、康之给定，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乃益见其自为的成心，而与历史异其面目。盖王官博士何尝认《王制》为孔子之书，又何尝以《王制》大法建立汉家制度，更何尝以《王制》统摄《六经》。⑩《史记·封禅书》仅曰：“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⑪ 如今本《王制》即博士诸生本⑫，则其非孔子作甚明。 如今本非博士诸生

---

① 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 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29 页。

② 康有为:《教学通义》,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③ 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98 页。

④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毛小林校译，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32 页。

⑤ 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氏著《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3 页。

⑥ 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 年 4 期。

⑦ 康有为：《考定〈王制〉经文序》，《康有为全集》（二），第 15 页。

⑧ 皮锡瑞《经学通论》“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条也说：“《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见《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 4 期。）

⑨ 刘咸炘：《〈周官〉〈王制〉论》，氏著《推十书》“左书”卷 2，成都古籍书店，1996 年，第 87 页。

⑩ 刘歆评董仲舒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董生传《公羊春秋》，其所“统壹”者也是以《公羊春秋》。

⑪《史记》卷 28《封禅书》，第 1382 页。

⑫ 章太炎《驳皮锡瑞三书》说：“然则《王制》者，博士抄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章氏又说：“(《王制》）不言崇五术，立五教，不言顺素王《春秋》。若《王制》为孔子所定，则汉立《公羊春秋》，乃不应孔子意也。今文家又喜言《春秋》断狱，《洪范》察变。今《王制》云：‘破律以乱政，杀。假于鬼神卜筮以疑众，杀’。夫《汉律》所不著，而以《春秋》为决事比，是破坏《汉律》。说辽东高庙之灾，以为当诛大臣；见虫食木叶之变，以为当禅位公孙氏，是假于鬼神以疑众，然则仲舒论死，眭孟刑杀，于《王制》适为应辟矣”（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53—454 页。）章太炎是否定孔子作《王制》的，我们也认为，汉文帝的博士作《王制》较可信。

本[1]，则文帝巡狩封禅之制度，不用今本，也不用博士本，孔子所立之法，汉家不采之。或谓，六经是孔子之书，博士刺之而作的《王制》即是孔子之法；可是，哪怕在“述而不作”的忠实的“述”中，解释者的下意识总隐藏着对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这一理解的前结构，实在是述者的作。故而，如谓博士刺孔子之六经而作的《王制》，完全原本孔子意思，这在解释学上，恐怕难以立据。何况，今文“五经”博士立于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 年），则文帝之《六经》未必尽是今文，盖贾谊博士即是通《左氏春秋》者；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作《王制》的博士中有习民间经学者如贾谊。并且，武帝封禅也不用博士制作之礼，则孔子为汉所造之大法，武帝也未采用（据《史记·封禅书》，汉儒为武帝制封禅礼，是兼采《周礼》《王制》，则汉初儒者之看待二书，也未如后世之是丹非素、出主入奴，更不以二者分门别派）。

至于《周礼》，廖、康、章、刘说是历史作品，非哲学之书，无圣王之制。然观王莽之利用《周礼》，与其说是“以史为鉴”，毋宁说是“托古改制”，如土地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等，悉与王官博士的改制说，同出一辙、若合符契。故王莽经营新朝，“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2]，是乃兼采《王制》和《周礼》，二者不偏废，也不独尊，全无对立之情势。刘歆议立宗庙之礼，谓《王制》《谷梁传》的昭穆之数与《左氏》合，其所引《礼记》祀典之文出自《祭法》，所提及的《无逸》之文，见诸博士本而民间本无之，是刘歆论礼制也不专宗《周礼》或古礼，乃兼用《王制》等王官礼学。马融、郑玄等注“三礼”，也是取沟通的态度，而非争辩的方法。所以，刘歆、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都相信《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作，将其看作义理哲学之书，未尝以史书目之。[3] 其实，康有为早年撰《教学通义》，也赞美周公之制有公学、有专学、有大学，既监察二代之文，又兼备三王之事，是集诸圣之大成，极其完美且完备；“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官万民，无不曲备；孔子以布衣之贱，不得为而但行教事。……经虽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经纶之迹”[4]。康氏非惟“尊周公、崇《周礼》”，说周公集大成，说孔子之法踵武《周礼》，且俨然以周公、《周礼》夺孔子、《王制》大圣大法之席尊。廖平经学“三变”而崇《周礼》为孔子之大统，其反复与康有为同，其制礼之深意也与康有为同，都因了经世致用的救亡图存之爱国心所驱动，而不得不求之于周孔，又不得不规之以时义，因时势之变化，制度之义也不得不随之而转圜。此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其提扬孔子、《王制》，贬低周公、《周礼》，孜孜于辨析今学、古学之异，原因是舆论必需[5]，本非根据于客观情实，如持以衡之两汉经学，则殆非历史之真际。

其三，孔学与史学。廖平《知圣篇》倡明“孔子作《六经》”之旨，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径称：“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6] 廖、康宣称，《六经》是孔子为拨正乱世、致引太平而创作，经书的义理是普适性的，经书的公理公法是历史秩序所唯一合适的精神意义，故经学即孔学，也是哲学。不过，在今文家中，前乎廖、康的龚自珍和后乎廖、康的崔适，又赞同

---

① 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见《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儒家罕言兵，若《兵制》者，或是杂采诸子学而成，盖文帝时曾立诸子博士。

② 《汉书》卷 99 中《王莽传》，第 4136 页。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本，第 637 页。

④ 康有为：《教学通义》，第 36—38 页。

⑤ 1898 年 7 月，孙家鼐上奏折，指责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是要令“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足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431 页。）

⑥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三），第 128 页。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也说，《六经》非孔子不能作。

“六经皆史”说，倾向古文家言。[①] 各人的意见不一，廖、康要改制，故托诸孔学；龚、崔稍客观，故尊重历史。与之相对，古文家章太炎、刘师培认为，孔子不曾作六经，而是编次六经，如《易》的卦爻辞是文王作，《尚书》《春秋》是史官的资料，《诗》是乐官所结集，《周礼》是周公作，孔子不过是对这些典籍进行整理和校雠，如刘向、刘歆的校书中秘，不可谓孔子创作六经。他们又重申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说六经是记载上古历史的典籍，是史学而非义理之哲学。

孔子曾否作六经，因前人辨之已明。[②] 现在要做的是，执诸人之说而夷求之两汉，观汉儒是否也持此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汉人无异词，而对于其余四经，两汉经生虽多未谈及，却也有逗露端倪。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删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序和删是“编次”，不得谓“作”。例如，A、易：孔子所“序”者是《十翼》，《卦辞》、《爻辞》仍是中古人所作，或文王或周公，司马迁并不以《易经》为孔子之书，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序》即承此说。皮锡瑞谓“《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征”[③]，此乃率心臆断，章太炎的《原经》《驳皮锡瑞三书》已辨正之。帛书《易》可证孔子与《十翼》关系密切，但卦爻辞终非孔子作，此亦显然之事，盖《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④] 若此篇是孔子作，则孔子明言《易》的卦爻辞作于中古时深怀忧患的文王。B、书诗礼：《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正言也。”《郑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⑤] 孔子“雅言”的诗书礼是先王的法典，在教学之时要用周王朝的官话来诵读，使其辞义明达；礼是不用诵读的，所以说是执行。郑玄是申明孔安国的意思，孔是官学博士，他说诗书礼是上古的典籍，孔子以之教授，或曾编次之，但并非孔子所创作。[⑥] 所以，《淮南子·要略》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⑦] 这里说，孔子是修习周成王、周康王的道德，传述周公的训典和篇籍，以教授学生、建立儒学，是修和述而非作。刘安的文化团队包括百家，儒家也在其中，其所言应可代表当时学界的主流意见。康有为早年也曾谓：“诸经皆出于周公，惟《春秋》独为孔子之作。”[⑧] 说周公或孔子作群经都不是客观的历史主义，汉儒经学信仰最为虔诚，但也不作如此臆断无据之语。

廖、康认定诸经是孔子“取义”所作之书，寓托圣人的微言大义，如近世的哲学。诚然，汉代王官学在于经世致用，博士解经也多附会现实政事，但如公羊的“三世三统”说可谓义理，如齐诗的“五际六情”说则牵强太过而流于神学主义，不可谓义理之哲学。而且，鲁学自申培公创始便重文字训诂，颇有“于大道不敢承”的求真精神，并不像燕齐学者那般，惟义理是求而割裂章句。况且，廖平初时也主《左氏》不传《春秋》，后又主《左氏》是今文学，说其释经也是自造事迹以发明素王之义理，故其五十凡例无一违背《公》《谷》者，三传的大旨皆相

---

① 见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崔适《孔子述作五经之大纲》，此说钱玄同揭之，见《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② 如章太炎《驳皮锡瑞三书》、《今古文辨义》及《古史辨》第一册所收的论经学的文章。
③ 皮锡瑞：《经学通论》“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征”条。
④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8《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9—90。
⑤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7《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2—2483页。
⑥ 《礼记·杂记下》说：“《士丧礼》于是乎书”，此谓旧礼崩坏，孔子曾“适周问礼”，犹记故书之言，于是著之竹帛，故言“书”，不言“作”。见章太炎《驳皮锡瑞三书》，第447页。
⑦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21《要略》，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
⑧ 康有为：《教学通义》，第39页。

同。[①] 这既可见出今文家的反复随意，又表明民间学也讲义理。因而，章、刘既否定孔子作群经之说，又发挥“六经皆史”说，指认一切经书皆史书，没有义理和哲学，这也不符合民间学的实际。如刘歆发见《左氏传》，从尹咸和翟方进“质问大义”，引传文解经，使经传转相发明而义理详备；观《汉书·律历志》所引刘歆解《春秋》“元始”之义与“三统”之理，皆与《公羊传》无异，则其所重者正在义理，未尝以史书目之。故刘歆数以《左氏》义理问难刘向，向“不能非间”，则博士刘向虽不赞同其说，但终究是承认《左氏》也寄寓大义。而王莽以经世的方式运用《周礼》治理新朝，也是把它看作改制之书、哲学家义理之言而非史书。东汉的贾逵、郑玄等发明《左氏》《毛诗》的义理而与王官学相敌，也表明民间经学的哲理性质，下文将详述之。况且，贾逵的《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②] 此处的“素王”与“为汉立法”说，岂非公羊学家之庸言？贾、郑采纳其说，岂非把六艺视作哲学之书而要发挥其微言大义？总之，王官学者未以六经为孔子所作，民间学者也不把诸经视为史书。

其四，义理与考据。基于孔学（哲学）与史学的对峙，反映在解经方法上，今文家廖、康强调微言大义，古文家章、刘注重名物训诂，前者以发明义理为职志，后者以文字考据为目的。他们将此推之两汉王官学与民间学，宣称彼此壁垒森严，各行其是，如“小国寡民”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可是，返观两汉经学解释史，这种界线截然的分区，完全不合历史情实。上文引钱玄同语已辨其无理，今不避文繁，详援钱氏的论证如下，曰：

> 今文家何尝不言训诂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诂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以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诂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诂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他的《让太常博士书》中有云：“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汉书·艺文志》为刘歆《七略》之要删，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当以此两词归之古文家，方为适当耳。若云微言大义即指《公羊传》所言“《春秋》之义”，则《孟子》、《公羊传》、《史记》、《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之义，皆无微言大义之称。且古文家之刘歆亦曾造有伪《左》的“《春秋》之义”，即所谓“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尝不言微言大义乎？微言大义两词既为古文家所创，则称“五十凡”等等为微言大义，更为切合，大概刘歆亦正指此耳。[③]

如钱氏言，第一，训诂名物是汉儒解经的基本功，无论王官博士，或民间学者，在学习治经之初，都是由此路径入门；否则，设若名物不懂、文字不识，则经文尚且不能读通，解释处处触壁，义理又何从谈起。且《汉书·儒林传》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④]，则《田氏易》最初也仅言名物训诂而忽略大义。又鲁学自申培公开宗，他“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⑤]，则鲁诗与毛诗一般，重视训诂而轻义理。又清人唐晏说：“《谷梁》出于鲁儒，其说最为有本”[⑥]，“有本”就是忠实经文原旨的考据，无过度诠释或哲理

---

①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 455 页。
②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 1《春秋序》，《十三经注疏》本，第 1708 页。
③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第 151—152 页。
④ 《汉书》卷 88《儒林传》，第 3597—3598 页。
⑤ 《汉书》卷 88《儒林传》，第 3608 页。
⑥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608 页。

的发挥，这是《谷梁》有类于训诂之书的缘故。如此，鲁学的特点是偏重训诂名物，故当献王刘德在河间立《毛诗》、《左氏》博士时，“山东诸儒多从而游”①，盖民间经生立足文字、严守本旨、慎言义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山东诸儒的训诂考据方法论最相近，于是也相敬相亲，共同切磋琢磨。

第二，民间学也研究义理，前文提到的刘歆的《左氏》五十凡例即为一证；颖容的《春秋左氏条例》五万言，或也如“五十凡”和杜预的《春秋释例》，皆解释凡例、发明大义之书。不宁唯是，东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争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左氏》。观二派经生所激辩者，全在经文义理的长短，未尝斤斤于简编的完或阙、真或伪。东汉初，章帝命贾逵发出《左氏传》大义之长于《公羊》、《谷梁》者，逵乃奏《长义四十一条》，几废《公羊》。徐彦说：“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逵之前。”② 则章帝所提倡者是《左氏》的义理，郑众和贾逵所表扬者，也在《左氏》的义理。东汉中叶，李育作《难左氏义》，其初志谓《左氏》“不得圣人深意”，而陈元、范升的互相非折，又“多引图谶，不据理体”③，所以他不满意而更有述作。这表明，经生所争的是义理，《左氏》学者的应对方式也在阐明义理；所谓的“不得圣人深意”，只是李育的偏见，无可无不可。东汉末，何休作《墨守》以距《长义》，造《膏肓》以短《左氏》，《拾遗记》谓之“言理幽微，非知机藏往，不可通焉”④。郑玄乃作《发墨守》、《箴膏肓》以敌之，今遗文尚存，覆案一过，皆理长理短之辩，非纯属考据家言。由是，汉代经生咸注心于开掘义理，无论王官博士或民间学者皆然，不得谓一讲义理，一讲考据，判然两途。当然，廖平也说：“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⑤ 似乎又不以义理来析分今古文学。实则是，廖氏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因汉儒的“义理”范畴是广义的，兼含制度与哲理，非如后世所理解的狭义的仅有“哲理”之意者。观许慎《五经异义》与郑玄《驳〈五经异义〉》之讼爵制、明堂制、葬礼、尊母爵等，可知汉儒在较论《五经》义理的长短时，是包括制度在内的。

第三，除了《左氏》外，民间经生也探究诸经之义理。A、易：郑玄《易注》今虽亡佚，唐李鼎祚曾见原本，说“郑多参天象”，“合彖、象于经盖自康成始”⑥，参天象是要推究宇宙之哲理，以《彖辞》、《象辞》连经文，是要发明经文的义理。故郑玄的《易赞》、《易论》虽也亡佚，但据所存的吉光片羽，如“《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又“《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⑦ 郑玄解“易”之义，既是训诂，也是义理的发挥，孔颖达说他“无所据”，正反映出他是自造新义理，此乃郑玄作二书的旨趣。B、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周防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⑧ 书今不传，然此皇皇巨著，若谓皆名物训诂之言，窃不敢信，必是义理为主方能言成四十万。C、诗：《毛诗序》是否卫宏所作，纠葛甚多，且遑论之。《后汉书·贾逵传》载，章帝令贾逵撰

---

① 《汉书》卷 53《景十三王传》，第 2410 页。
②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序》，《十三经注疏》本，第 2191 页。
③ 《后汉书》卷 79 下《儒林传》，第 2582 页。
④ 王嘉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55 页。
⑤ 廖平：《今古学考》，见《廖平 蒙文通卷》，第 43 页。
⑥ 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29 页。
⑦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 1《论易之三名》、《论三代易名》，《十三经注疏》本，第 7、9 页。
⑧ 《后汉书》卷 79 上《儒林传》，第 2560 页。

“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①，（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作《诗异同》。）逵又作《毛诗杂义难》十卷，今也不传，但章帝曾令逵发出《左氏》义理，想此也如是，亦言义理之属。D、周礼：贾公彦《周礼注疏》云：“临孝存……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平之变，故能答林硕之论难（即《答临孝存周礼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② 可知，郑玄是把《周礼》当作“太平之变、后王之法”之书的，这也是对制度、义理之研究，详见皮锡瑞《答临孝存周礼难疏证》。总之，汉代民间经生和官学博士都重名物训诂，也重义理发明，他们对于诸经都有解诂和释义的著述。如晚清经学家描述的义理与考据的对立情况，夷求之于两汉，绝非昔日之情实。

此外，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又说今文家多主纬候，古文家多主史册。但是，刘歆推演《左氏》日食变怪之事，贾逵摭拾谶纬解《左氏》，郑玄杂引神怪笺注《周礼》、《毛诗》，这又何尝不主纬候。可见，汉代民间学者同样也主纬候，廖平之说不确。③ 此表之谬误处尚多，今不再逐条驳斥，读者从以上四例的辨正，即可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三

综合上述，晚清诚有今文与古文之争，今文学家所以斤斤于文字的今古，是旨在借文字之为古体而激发人们的怀疑主义，从而判定孔壁中书、河内诸经如《逸礼》、《周礼》、《尚书》等是伪造的，《左传》是不传《春秋》的，所谓的古文经非伪即与经书绝无干系，惟有所谓的今文经才是真的经书或解经之作，故应尊今文而发挥孔子改制之大义，为现在之世界重立法典，有序渐进地改革之而引导之至于天下大同。站在哲学家的角度说，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经学，都能成一家之言，开创一片全新的思想境地，启益后来者良多。然而，哲学家往往又不是严肃的历史主义者，其对经学史的解释，并非持守完全科学而客观的诠释方法，通常都打上了自我主体性思想的色彩，即陆象山说的“六经皆我注脚”。所以，哲学家所理解的经学史多少都带有“成见”，虽非不可信，却是不可全信，如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说即其一例。

我们认为，汉代经学论争的实质，是王官学的经世致用与民间学的求真求是的异质精神的矛盾。观汉人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④，《景十三王传》“从民得善书”⑤，《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⑥（《论衡·佚文》作“《百二尚书》传在民间”），《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⑦，马融说：“（《周官》）出于山岩屋壁”⑧，《论衡·正说》“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⑨，郑玄《书论》有“民间得《泰誓》”（又见刘向《别录》）；以上的从民、东莱、孔壁、西州、老屋、山岩，都如郑玄说的“民间”。刘歆《移书》便以“学官”与“民间”对举，班《志》的某经有某家列于学官，某经民间有某家之说，或有某家未列于学官，皆是以“王官学”

---

① 《后汉书》卷 36《贾逵传》，第 1239 页。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序》，《十三经注疏》本，第 636 页。
③ 此论见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
④ 《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06 页。
⑤ 《汉书》卷 53《河间献王传》，第 2410 页。
⑥ 《汉书》卷 88《儒林传》，第 3607 页。
⑦ 《后汉书》卷 27《杜林传》，第 937 页。
⑧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序》，《十三经注疏》本，第 635 页。
⑨ 《论衡》卷 28《正说》，第 547 页。

与“民间学”为学术的分际。① 汉儒也习称之“今学”与“古学”，然今、古只是版本的问题，不足以概括二派学术的特性，未如“王官”与“民间”之称谓，反而能将二派所代表的学术立场清楚地显示出来，即王官学代表政治意识形态，民间学代表大众意识形态。东汉习《毛诗》、《周礼》、《左氏》者，多在民间开坛讲学，如马融居家教授，学生多达数百，升堂入室者五十余人；郑玄讲学乡里，“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遍布全国各地而为儒宗；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人”。（皆见《后汉书·儒林传》或本传。）另如卢植、许慎等也曾开展讲学活动。这些相对于太常博士官学的民间学术研究和传播，在东汉末年逐渐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故魏晋以还便取王官学而代之。

当然，如更追究王官学与民间学的内涵，今文家的一些研究也有可取的地方。廖平讲今学是糅合鲁学和齐学而成者，蒙文通更发挥之而往上追溯其渊源，说：“始皇的博士是合鲁学、齐学和方士的内学为一家的。……汉人所讲的今学，便是这三派合成的。”又说：“是知十二博士之间，有齐学，有鲁学，所谓义虽相反，即谓此鲁学与齐学之相反，五经同异，即此鲁学与齐学之同异也。……鲁学谨严，齐学驳杂。……言六艺者，鲁人之学，非齐人之学也。……鲁以六艺为正宗，齐为百家所聚萃。”② 燕学属齐学一系，齐鲁之学异者多而同者少，鲁学则与民间学颇通约。蒙先生以鲁齐燕学分辨王官学的实质，又考之周秦而区别鲁齐燕学的性质，这些都是精审之论，启诱来者。但主今文者深入门户之见，乃过于强调王官学与民间学的分区，以民间学为晋学、楚学，是与哲学相对的史学，这就失了汉儒治民间学的宗旨，盖如上文所论，治《周礼》、《左氏》者也重义理，并不目之为史书。今文家又说今学尊《王制》是王道，古学尊《周礼》是霸道，然郑玄乃以《王制》的大聘和朝礼为“晋文霸时所制”③，实则是把《周礼》看作王道之制，故王莽才用以治理新朝。这些说法都是与东汉民间学的实情相违左者。况且，从楚地出土的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的儒家书看，楚学所传的六艺之学绝非史学所能概括，也甚重义理哲学之阐发，如《孔子诗论》《性自命出》等。故与之相近的晋学，应也非史学所能范囿，盖子夏、曾子传经西河，又何尝舍哲学而专注史学。若民间学（古学）果然出自晋楚，亦是义理与训诂并重，与燕齐之学疏远而与传孔学之真的鲁学相近。

诚然，晚清今文家不是严肃的历史主义者，而是希求经世致用的哲学家。他们研究今文学，不是要复两汉今文学之古，而是要举二千年僵固的传统文化而解放之，再发展出能拯挽衰颓式微、乃至有亡国之虞的华夏民族的救世哲学。故而，他们不是虔诚的神学诠释学者，而是运用人文主义的哲学诠释学，并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寻求突破传统内部存在着的限制自由思想的力量，从而对经典文本进行多重意义结构的现代性重建。④ 这也就是，何以他们自认得了孔学的真传，而时人却谴责他们毁了孔子的神圣的原因。⑤ 他们师法汉代公羊家的改制、三统、大同说，他们也遗传了公羊家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他们努力以《王制》与《周礼》、孔学（哲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来划分经今古文学；可是，他们雄辩的理论完全经不起科学历史主义精神的叩问。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用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来取代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这绝不是简单地把晚清经今古文家所划分的二派的经书及争论的性质，重新派分给王官学和民间学。这是没有意义

---

① 学术有王官、民间之分，是上古思想史的情实，此说章学诚《文史通义》言之颇多，章太炎“诸子出于王官”说、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也都“接着讲”，今标示此名，亦有接续传统之意。

②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 30、84、85、86 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 11《王制》，《十三经注疏》本，第 1327 页。

④ 如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说的，康有为的诠释学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诠释学洞见与判断，设法掘发原思想体系表面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出来”。转引自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 年，第 56 页。

⑤ 参见苏舆辑《翼教丛编》。

的，也不符合两汉经学的情实。如本文所揭橥的，王官学与民间学对孔子素王之尊的推崇，对经学中心思想的认知，及对解经方法论的运用，都没有晚清经生所强调的那种泾渭分明的区判。相反，王官学和民间学是有调和与融合的，也有共同的学术精神，我们可以超越二者间的一些不甚紧要的辩争，而做综合沟通的研究，不再汲汲于今古文之边缘上，只见对立，不知统一。

申言之，王官学与民间学固然存在争立博士、论辩义理的事实，但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地对峙，争论的层次和范围都不甚广深，焦点多集中在《左氏》和《周礼》，另三部经书则较少涉及。相反，两汉经生超越王官学与民间学的界限，尝试取消隔阂而沟通彼此的，则大有人在。如景帝时的丁宽传《田氏易》，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武帝时的河间经术“与中朝之学术不同”①，而鲁学者多从而游，与民间学者交流甚欢；孔安国习《鲁诗》和伏生《尚书》，又传孔壁《尚书》，司马迁从之问学，也通习之，故孔家王官学与民间学并行不废；萧望之治《齐诗》、《仪礼》而“善”张禹之《左氏》；尹更始、尹咸、胡常、翟方进等皆以谷梁家而兼习《左氏》；刘向采《左氏》作《说苑》、《新序》、《列女传》；《盐铁论》的贤良文学、御史大夫、丞相史，或习《毛诗》，或习《左氏》；庸谭习《齐论语》，又习孔壁《尚书》；又东汉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张驯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许慎《五经异义》平分王官学与民间学。这些只是略举大概而已。或谓，郑玄遍注群经，参用比附，混淆王官学与民间学；其实，在玄之前，欲“混淆”者多矣，又岂自玄始。

所以，过去的百余年里，因受晚清经今古文家所区分的经今古学壁垒森森的观念的影响，两汉经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和解析方式，几乎群趋于“比较分析”一途。人们的思维受今学与古学的二元对立理论的主宰，执此而衡之两汉经学，乃常有非此即彼的倾向，甚或是是此非彼的偏见，以致完全漠视两汉经学内在的一体性与融通性，对古代经学思想中某些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造成了难以弥缝的隔膜感，乃至莫大的割裂之害。逝者如斯，桑榆非晚。窃以为，百余年后的今日，应该扬弃过去纯属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而运用综合归纳的辩证逻辑，探求经学内部各方面、各因素与各层次的机理与功能的联系，从而对经学思想获得更具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2］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
［4］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载《近代史研究》1990 年 4 期。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年。
［6］顾颉刚编：《古史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7］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8］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9］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10］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一、二、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廖平 蒙文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3］刘师培：《刘师培讲经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
［14］刘咸炘：《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 年。
［15］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6］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

---

①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7 年，第 84 页。

［17］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18］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19］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
［20］钱玄同:《精读钱玄同》，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 年。
［21］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22］尚秉和:《易说评议》，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
［23］史杰鹏:《〈仪礼〉今古文差异释例》，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3 期。
［2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25］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26］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2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28］王充撰，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29］王国维:《观堂集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30］王嘉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31］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2］汪荣祖《康有为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33］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2006 年。
［34］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 4 期。
［35］张岱年等:《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
［36］张灏著，高力克、王跃译，毛小林校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37］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见章太炎、刘师培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38］章太炎:《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9］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40］苏费翔:《钱穆两汉经今古学研究》提交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变动时代的经学和经学家（1912—1949）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 年 7 月。

The Jinwen and Kuwen Controversy in Late Qing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Controversy in Han Period

HUANG Yanqia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Wuhan University; hyq4413@aliyun.com)

The Jinwen and Guwen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rose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involved scholars including Liao Ping traced this academic phenomenon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ses Liao Ping's works and further proves that the characters of th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period did no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Jinwen and Guwen, but the official academy and the folk academy. The scholars of the official academy did say all of the classics were philosophy, and the scholars of the folk academy also never regarded the Confucianism as historiography. Both paid the same attention to argumenta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Therefore, the Jinwen and Guwen controversy was the unique academic phenomenon in the late Qing. It is not reasonable for us to inherit thus opposite position to comprehend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